

关东枭雄 奉系悍将

——吴俊升

点评：

在天生我材必有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民国时代，吴俊升——一个大字不识、粗莽凶狠的武夫，凭着勇猛善战和阿谀奉承、媚上欺下的厚黑权术，竟然成为堂堂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一省的土皇帝。在旧中国官场这个大酱缸里，吴俊升学会了巴结权贵、见风使舵的各种手法，他原与张作霖平起平坐，明争暗斗，在张崛起成为东北王之后，吴俊升抱住张作霖的大腿，溜须拍马：助奉张称霸东北，逐鹿中原，战败郭松龄，屠杀大刀会，跻身于奉系集团重要将领，由清朝的“勇将”变为民国的“福将”，势焰日炽，声名远扬。

吴俊升有钱就抓，巧取豪夺，军阀中只能属二流，敛财上却堪为上乘，其财富比军阀首富张作霖竟高出近三倍；堪称全国最大的富豪之一；四大爱好：声、色、猴、马，令人捧腹……就是这样一个货色，统治了黑龙江达七年之久。然而，日本人在皇姑屯埋下炸弹，一声巨响将张作霖和吴俊升送上西天，应验了与张作霖“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的话，终于被历史大潮无情抛弃。

出生入死 剿土匪 小马倌成为“四大重镇”之一

吴俊升，原名兆恩，字秀峰，后改名俊升，字兴权，号子琴。1863年11月21日生于今辽宁省昌图县老城乡长青村兴隆沟一个贫苦农家。祖籍山东历城，世代务农。咸丰末年，山东年景不佳，吴家为生计所迫，外出谋食。其祖父吴天福迁到关外，落户昌图北。父吴玉、母李氏，生4男4女。吴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昆弟中居长。二弟吴兆荣，后改名俊武，为吴俊升同胞手足，三弟吴兆巨，后改名吴俊隆，小弟吴俊卿，皆吴之异母兄弟。吴俊升“幼时近不慧，涕唾盈握，父玉颇不喜”。吴俊升5岁时，随父迁居昌图府郑家屯。其父在蒙古马市上当马贩子。受父熏陶，吴俊升长大后也以贩马为业，而耽赌博，混迹于宵小之中，是一个不事正业、不服管教的流氓无赖之徒。吴俊升生长在一个贫苦农家，因而失去就学机会，七八岁就开始执鞭给当地王大店家放牛马，一年挣得白银一二两，以补贴家用。每天晨曦微明他就驱赶畜群在草原上放牧，迨夜幕降临时，才能收拢畜群回到主人家。这个穷“马倌”衣衫褴褛，鼻涕“过河”，伙计们都不愿与他同桌共餐。由于只有一条露肉的裤子遮体，换洗时他只好躲在水泡子里遮羞。

当“马倌儿”，夏天还算好过，冬天可就更苦了，不是缺衣就是少帽，难以御寒，所以，经常冻坏手脚。有一次，吴俊升的嘴被冻坏了，还落下了个后遗症。从此，他的嘴再也闭不严了，口水长流，胸前总是湿乎乎的一大片，而且还影响了发音，一说

话总是“呜一鸣”的，所以，人们给起了个不雅的绰号——“吴大舌头”。而且，在东北，提起“吴大舌头”，可以说是男女老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好在吴俊升是个天生的乐观派，对此并不知愁，也不以为苦，放马时，他仍是追兔子抓鸟、逮蛐蛐捞鱼，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有些事往往是有所得亦有所失、有所失亦有所得。这一段艰辛的“马倌儿”生活却使吴俊升得到了一些意外的收获。首先，他学会了一手高超的骑马和相马的本事。他虽然个子小，还够不着马背，但他有股子虎劲，不怕摔，而且还善用“就坡骑马”之技，所以，也就渐渐学会骑马了。后来，由会而精，竟可以不管多么烈性的马，都能制得服服贴贴。由于终日与马为伍，渐渐使他对马了如指掌，好马坏马，一眼就看得出来，活脱脱地成了一个伯乐。其次，牧马人的生活也锻炼了吴俊升的胆量和勇气。那时，东北地旷人稀，荒原水畔，野狼成群，而草地上的马群又很招狼，所以，放马的人必须胆子大，非但不能怕狼，而且还要敢于和狼打交道，把它赶走。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后来，吴俊升之所以能以胆大勇猛著称，和他的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不无关系。

大约在吴俊升 15 岁的时候，兴隆泉村北面的鹈鹕林镇准备成立一个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保安小队，要征召 30 名年轻人当队兵，所需枪、马等向当地的大户摊派。吴俊升此时已经知道考虑自己的前程了。他想：种地这个行当，脸朝黑土背朝天，顺着垅沟找豆包，太苦，太累，还太穷，而且又没有出人头地之日，所以，断不能干一辈子，一定得想出个别的出路。同时，他对自己是块什么材料倒也是有一个颇为客观的估量。他知道自己没念过书，所有对与舞文弄墨、咬文嚼字有关的差事都一窍不通；做买卖又没本钱，况且也没长那个脑袋。然而，天生我材必有用，

自己的长处是身强体壮，胳膊粗力气大，骑术精良，就凭这些，当个骑兵是没有问题的，说不准儿还会就在这条道上飞黄腾达呢！当时，虽然有那种“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话，但如今也顾不得这些了。于是，吴俊升就到鹞鹞林镇去报了名。招兵的见他岁数虽然小，但人却长得和大人一样高，而且还有那么一股子虎劲儿，所以，就把他收下了。

吴俊升当上了骑兵，真是如鱼得水。且不说马骛鞍破，人还是满有精神的。他膂力过人，马术精湛，又有一股子不怕死的猛劲儿，每次打仗，都冲锋在前，不打垮敌人不罢休。郑家屯附近时有打家劫舍的蒙古人的骑匪出没。这些骑匪不但骑术精、枪法准，而且善用套马杆，打仗时，他们先用长长的套马杆把对方套住，然后拉下马来，再挥刀砍杀，不少官军就这样丧了命。但这一着对吴俊升却不灵，因为他力大过人，蒙匪虽然可以把他套住，却不能把他拉下马，三拽两拽，自己反被拉下了马。这样的事有过几次以后，蒙匪都很怕他，望而生畏，一见骑一只眼的马、配一只木头鞍子的吴俊升过来，便纷纷逃避，不敢与之交手。因此，吴俊升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他二十四五岁时，终于当上了班长，成了兵头将尾；34岁时，当上了把总（相当于连长），竟成了带兵百余的军官。

吴俊升不但打仗勇猛过人，而且也颇用心计，所以，他并非是一个有勇无谋之辈。他没有读过兵书战策，却能成功地运用“欲擒故纵”之计。有一次，一大股土匪要进攻八面城。八面城的乡绅商请官军协助防守，于是，吴俊升奉命率部进驻了八面城。土匪听说前来驻防的官军只有100多人，就没有太在意，仍一意孤行，按原计划攻城。他们先在东门外摆好阵式，准备进攻。吴俊升在城上一看，土匪足有400多人，而且装备精良，手中拎的清一色的都是俄造大子连珠枪。而他自己的队伍虽是正规

军，装备却远不如土匪，所用的大枪都是过了时的汉阳造单响来复枪。如此的力量对比，虽有围墙作依托，也难以取胜。这时，吴俊升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命令部队马上从西门撤出，并且故意做出慌慌张张的样子。八面城的老百姓见此情景，都暗中骂吴俊升徒有勇猛的虚名，原来也是个贪生怕死之辈。土匪们一见官军退走，也认为吴俊升害怕了，遂大摇大摆、乱哄哄地进了城。匪首高兴得忘乎所以，竟然下令三天不点名。于是，众匪大肆抢劫，狂吃滥饮，毫不戒备。到第三天晚上，匪徒们仨一帮，俩一伙，胡作非为，而吴俊升却率部悄悄摸进了城，突然开火，猛冲猛打。土匪们猝不及防，被打得死的死，逃的逃。当地乡绅这才如梦初醒，齐声赞扬吴俊升为民除害，胸有良策。这样，吴俊升的名气越来越大了。

吴俊升不但打起仗来有勇有谋，而且在如何取悦上司方面也今非昔比，大有长进，一点也不外行。二十多年的行伍生涯，使他仅留下一个粗俗鲁莽的外表，而朴实、憨直的性格却丢得一干二净，学到的是如何欺下媚上的手段。这一切都为他步步高升铺平了道路，创造了条件。此后的几年里，他官运亨通，不但连年提升，而且越级提升。1898年，吴俊升以把总带队讨伐海龙、通化地区的土匪，因功越过“守备”一阶直接提拔为都司候补。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他以都司候补衔任辽源总巡，驻防要地郑家屯。当时，土匪乘日俄火并、兵荒马乱之机，猖獗活动。其中，报字“双如意”的一伙土匪200余人受害最烈。他们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有日本人撑腰，所以横行无忌。8月24日，日本人高如龙、松得胜二人带着两名随从到郑家屯见吴俊升，声称他们已将“双如意”匪股收编为日本军队，须入郑家屯内登记造册，待领到饷银后再调走，请吴俊升准许。吴俊升听完他们的要求之后，断然予以拒绝，非但不许“双如意”匪股人

城，而且距城百里之内的范围也不许进入。两个日本人见吴俊升态度强硬，只好放弃无理要求，灰溜溜地离去。吴俊升为防不测，一面将此事详情禀报盛京将军增祺；一面令部下于城外险要之地设防扼守。不出所料，次日，探马来报，“双如意”带五六名随从要来郑家屯“医伤”。吴俊升闻后，立即带兵前去搜捕，“双如意”急忙远遁而去，再未敢进入吴俊升辖境。事后，增祺认为吴俊升对此事处理得十分恰当，既未引起中日纠纷，又驱逐了“双如意”匪股，因此对他褒奖有加，授以都司衔。

1905 年，郭尔罗斯一带匪患严重，增祺曾派宝帮带率军征剿，但宝帮带征剿不得法，致使土匪越剿越多，当地民众苦不堪言。于是，当年 12 月，增祺乃派吴俊升往剿。他吸取了“兵来匪去，兵去匪来”的教训，一面派士兵改装易服，设埋伏突袭股匪；一面派兵在各要点长期驻扎。土匪碰了几次钉子、吃了几次大亏之后，再也不敢在当地胡作非为，不得不流窜而走，从而使郭尔罗斯得以安宁。1906 年 2 月，清军绿营改制，吴俊升及其所在部队被编入奉天省后路巡防营，他也被任命为帮统（副统领）。1907 年，他在吉林讨伐土匪中再次立功，于是，又越超“游击”一阶而直接擢升为参将候补。1908 年，由于统领马瑞禄调转黑龙江省，吴俊升升任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此后，他在蜂蜜山围剿土匪又得战功，越“参将”一阶而升为副将候补，并被授予“勇将”称号。1911 年 12 月，清廷又擢升其为总兵候补。这个昔日的小“马倌儿”从 17 岁入辽源捕盗营开始，奋斗了三十余年，终于当上了独镇一方的清军大员。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常常把农民起义队伍诬称为匪，但吴俊升所剿之匪确确实实是匪。他们和农民起义队伍绝不可同日而语，其主要成分既不是受剥削、受压迫的贫苦农民，也不是“劫富济贫”的梁山好汉式英雄豪杰，而是一些

兵油子、流氓恶棍、赌徒色鬼之类。他们烧杀掠抢，奸淫妇女，横行无忌，为害一方。匪患严重的地方，不但清王朝的法律失灵，就连起码的人伦道德也荡然无存。土匪把抓人叫“绑票”，把打人叫“拷秧子”，把杀人叫“撕票”，把强奸妇女叫“压裂子”……。这些叫法充分暴露了土匪对人的尊严的侮辱，人类社会的文明完全被玷污了。这些地方也变成了禽兽肆虐的场所。因此，不少地方的民众过着日日夜夜都提心吊胆“躲胡子”的悲惨生活。当时，剿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边要各处，人烟寥落，林木阻深，夏则瘴雾弥空，冬则坚冰遍地，匪徒因得啸聚其间，恣行劫掠。迨官兵一至，其弱者散居闾里，无可穷追；其黠者，铤走山林，显然对抗。在军士等随时侦捕，冒险进攻，其艰苦情形，实不殊于前敌”。在这种情况下，吴俊升不畏艰险，英勇出击，剿灭土匪，保一方平安，使当地民众生活不再动荡，生命不受威胁，应该说是合乎民意、顺乎民情的，是做了一件有益于社会的好事的。

吴俊升自从升任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后，在奉天省军界中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了。因此，他与张作霖、冯德麟、马龙潭等齐名，并称为奉天“四大重镇”。

厚黑有术 冤家变死党

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政局仍动荡不宁，帝国主义乘机唆使中国反动势力，阴谋制造暴乱。原清廷内务府大臣肃亲王善耆勾结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组织了宗社党，策动“满蒙独立”运动。他们支持蒙古反动分子喀喇沁王等招兵买马，拼凑“勤王军”，

妄图建立“满蒙王国”。1912年6月8日，日本陆军大尉松井清助等以领取农业机械为名，给“勤王军”送去50大车的枪械弹药，护送马队从公主岭行至郑家屯时，被吴俊升侦知，将其截获，悉数炸毁。双方交火时，打死日本侵略分子13名，土匪30人，叛匪9人，重伤松井。日本侵略分子仍贼心不死，继续武装偷运军火，均被吴俊升所部一一击溃。吴俊升此举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使其以失败而告终。

与日寇策动“满蒙独立”活动的同时，沙俄又支持内外蒙古叛匪在东北窜扰，蒙古图宾王为部下及众匪徒所拥立，再犯洮辽，败吴俊升于康平县辽阳窝堡间。辽源、掏鹿、西丰等地因之皆危。时俄使又通牒袁世凯，要他承认其独立，否则即武力解决。同时还遣人至吴俊升处游说，愿以东蒙古王位、上将军及赠军饷5万卢布相许，诱使吴俊升上钩，吴均拒之。

1912年4月，东部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图郡王乌泰叛变，向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表示“诚心归投”，哲布尊丹巴任命乌泰为进攻中华民国的第一路总司令。乌泰叛国活动早为东北当局察觉，为加强防务，奉天都督令吴俊升扼守洮辽一带，并拨陆军炮兵一队归其节制。袁世凯以讨伐蒙匪至难，令赵尔巽督饬吴俊升所部与左路巡防队4营、混成协骑兵2营、24镇1协，23镇1协共同反攻。东北当局在派兵的同时，还派员前往劝谕乌泰，并电准将该旗借款30万减免，而乌泰非但不遵从，反而于8月16日，在靖安县（今吉林省白城市）发布告示，“驱逐汉官”。吴俊升率马、步10营及山炮1营，计3000余人，自郑家屯驰赴洮南兜击，与黑龙江省都督宋小濂派出的许兰洲巡防队形成夹击之势。是时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亦宣布独立，派乌印军带叛兵千余人逼近广安府。赵尔巽仍主劝导，以息事宁人为

重，令吴俊升派员前往该旗晓谕，慑以兵威，晓以大义劝阻起兵。但蒙匪乌泰已死心塌地要叛国独立，于 8 月 22 日，在归流河南岸的白庙发布《东蒙古独立宣言》，公开举兵叛乱。叛匪分兵三路向洮南、开通（今通榆县）、突泉进犯，妄图一举攻陷洮南，并声称兹宣告独立，与中国永绝。科右后旗镇国公也追随乌泰同时叛乱，并里应外合占领镇东县城，叛匪一时得势，忘乎所以。袁世凯急调 20 镇、23 镇及奉天巡防队击之。蒙叛匪甚是强悍，各路大军进剿收效甚微，独吴俊升所部一战而挽回颓势。吴指挥所部初与敌接仗互有胜负，后采纳了书记官董吉庆提出的剿抚并举之策，以分化瓦解裹胁者，孤立主要叛匪，收到奇效。8 月 25 日，剿匪军抵达信阳窝堡。26 日，克复镇东，毙匪徒 23 名。28 日，追至洮南东南之特安堡，将匪击破，嗣与吉林高凤城 23 镇会师，叛匪始渐后退。此后吴俊升所部与叛匪军又连续展开激战，相继打败叛军，解除洮南之危。

吴俊升因剿灭乌泰叛匪有功，于同年 10 月晋升陆军少将，授勋五位，获四等嘉禾章。12 月，获三等文虎章。此次平定乌泰叛乱之胜利，粉碎了沙俄分裂中国的图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吴俊升也因此以骁勇善战扬名塞外。有人评论称吴纯系武人，毫无政治才干，但生性强悍，亲临实战时，其作战之妙，在奉军将领中无出其右者，其论不为不公。

1913 年 2 月，袁世凯将奉天后路巡防队抽调一部编成陆军骑兵第二旅，直隶中央，吴俊升任旅长兼后路巡防队统领官。骑兵第二旅辖第三团（团长诺门巴图，副团长梁忠甲）、第四团（团长石得山）。同年 5 月，吴俊升加陆军中将衔。时边境叛匪在沙俄煽动下侵扰一直未靖，乌泰残存股匪时作南来侵扰之计。奉天都督张锡奎指令吴俊升“详筹战守”。

1913 年，库伦蒙逆，扫众长驱，进踪热河，……绥远数千

里，屠杀焚掠，几无完土，而经棚（今昭乌达盟翁牛特旗境内）、林西诸地糜烂尤甚。8月，库伦蒙叛匪4000余人在沙俄唆使下，进犯辽源，被吴俊升所部击败。11月，吴俊升督队征剿蒙匪于经棚、驼罗、大王各庙。在这次战斗中，吴俊升负伤遇险，幸得部下梁忠甲奋力救助方化险为夷。此役使蒙叛匪不敢向南者10余年。吴俊升因功得二等文虎章，晋勋三位。12月，吴俊升擢升林西、经棚地区守备司令官。

1914年3月，吴俊升擢升洮辽镇守使，驻节洮南。吴不仅握有军政大权，而且还凌驾于东部内蒙古王公之上，俨然成了地方“督军”。

台湾作家柏杨先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比作一个大酱缸，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一入其内，原来的新鲜和特质都会逐渐消失，最后全变成了一个味——臭大酱味。这当然有失偏颇。其实，传统文化中新鲜有活力的东西还是不少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大酱缸。但是，如果说旧中国的官场是个大酱缸，那却绝非言过其实。不管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只要到官场里混久了，无不变成唯利是图、欺下媚上、暮气沉沉的政客。近代的中国，曾有多少怀有舍身报国之志的热血青年，只因走入了官场，就变成了与其初衷背离的军阀、党棍。吴俊升本是个纯朴的农家子弟，因为在行伍和官场里混的时间长了，也就渐渐地把原来的纯朴一一丢光了，又把官场里的恶劣习气一一学会了。不但学会，而且精通，尤以善于巴结权贵见长。巴结权贵是那时官场的必修课。这门课很有难度，没有点灵性和悟性还不一定能学好。说它难主要难在两点。其一，在那个群“雄”并起的时代，要有足够的判断力，判断出谁最有“前途”，然后抱住这条大腿，才能官运亨通。如果一时糊涂，烧香烧错了庙门，那就不能官运长久了；其二，那时的国家和地方的军界、政坛，在不断的争斗中，首脑人物会

不断更换，所以必须有朝秦暮楚的本事。今天是张三当家，就奔走于张三门下，明天李四当了权，又要见风使舵，转投李四门下，并要能取得李四的信任。不过，这门课虽难，吴俊升却学得很出色，他对张作霖的态度的变化，是他交上的一份满分的答卷。

吴俊升是张作霖的得力干将和忠实走狗，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但在当初，双方却是互相排斥的关系。吴俊升认为和张作霖相比，自己年龄大，来路正，资历深，战功高，所以根本没把张作霖放在眼里。

说来吴俊升和张作霖很有缘份，二人都属猪。但吴俊升这头猪生于清同治二年（1863），张作霖这头猪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吴俊升比张作霖整整大了 12 岁，所以，吴俊升视张作霖为晚辈。

吴俊升是行伍出身，而张作霖则是马贼出身，所以，吴俊升认为张作霖来路不正，颇有些瞧他不起。他常对别人说，张作霖是杀人放火受招安当上官的，并还曾当面向张作霖提及此事，弄得张作霖十分难堪，他自己却在一边自鸣自得。

当时，吴俊升的官场权术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因为他还没有看出张作霖将要成为奉天省乃至整个东北的独裁者，没看出自己的荣辱终将由张作霖决定；他只把张作霖看成是一个爬得很快、令人嫉妒的同僚；他从心里瞧不起这个同僚，所以对这种嫉妒并不掩饰，时时公开表现出来。当时，奉天各路巡防营都归省巡防营务处统辖，有时两人同到营务处公干私干，自然不免低头不见抬头见。见面时，少不得握握手，拍拍肩，寒暄几句。吴俊升身材高大魁梧，张作霖则矮小干瘦，所以每当握手时，吴俊升总是尽量离张作霖近一些，以便用自己的高大来与张作霖的矮小形成鲜明的对比，目的是以此来在心理上压张作霖。

言谈中，也常常话中带刺。张作霖虽然心中很恼火，但却颇有忍耐力，他的志向何止一个统领，夺取奉天省的军政大权也还只是近期目标。他知道吴俊升这人混得很，惹恼了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每遇到这种境况，并不与之计较，只是嘿嘿一笑了事。吴俊升见张作霖如此隐忍，以为他胆怯了，得意之余，言行更加放肆。

1909年春，张作霖剿匪归来，率部去新的防地洮南府，路过郑家屯。此时的张作霖，名气大振，实力大增，又得到了清廷的嘉奖，再也不是一年前受吴俊升奚落的时候了。他率领队伍，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进郑家屯，也没和吴俊升打招呼，直接就住进了西街的一家大商号“丰聚长”。吴俊升得此消息，一面赶紧吩咐摆宴，准备给张作霖接风；一面派人去请张作霖。张作霖记恨着吴俊升一年前给他的羞辱，听卫士报告说吴俊升派人来请他，要给他接风，连见也没见来人就一口回绝了。吴俊升见张作霖不来，知道是因前嫌未释，看看天色已晚，只好亲自去请。他来到“丰聚长”门口，请卫士往里通报，就说吴兴权来见。卫士进去了一会儿，出来说张统领已经睡下了，吴统领改日再来吧。这下可难坏了吴俊升，那边酒席已经摆好，坐陪的部属和当地的名流都已请到，请不来客人多没面子呀。他现在的处境和一年前张作霖求见他时一样，站在门前，进也不是，走也不是，不知如何是好。早春时节，乍暖还寒，站了一会儿，吴俊升的气上来了：他妈的，请不来，老子还不请了呢。他抬腿刚想走，又一转念：我不能走，不能为斗一时之气坏了自己的大事，就在这儿站着，也是向张作霖表示诚意的好方法，他总不能让我在这儿站一夜吧。此时，张作霖并没有睡，正和手下的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人闲谈，他让卫士说他睡下了，就是要治一治这个可恨的大舌头。过了很长时间，卫士又悄悄进来报告说，吴俊升没走，

还在门口站着呢。张作霖一摆手说：“他愿意站着就让他站着吧。”一旁的张景惠、张作相等人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就劝张作霖适可而止，杀人不过头点地，他站了那么半天，也就行了，别搞过了火，以后还得在一块儿共事呢。张作霖见他们都这么说，也只好作罢。但他也不想轻易地饶过吴俊升，一定要给他个下马威。于是，便在“丰聚长”三套院后面的广场上，命令两队戎装佩剑的卫兵，列队举枪，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式，要让吴俊升钻“刀林剑丛”，灭灭他的威风。吴俊升知道这是张作霖对他的报复，觉得好笑，心里说：“老子战场上的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还会在乎这个。”他在马弁们的簇拥下，不以为然地在刀枪阵中钻了过来。这时，张作霖从屋里迎了出来，仿佛不知道一切都是他一手安排的，故作恼怒地骂了起来：“他妈了个巴子的，谁叫你们来这一套，拿刀动枪，吓唬谁呀，噢，兴权大哥，什么时候到的？我跑了一天的道，累了，刚才睡着了，大哥来找我什么事？”吴俊升说：“老弟回来，呜，大哥有失远迎，今晚请老弟到我那儿喝两盅，一来算是给老弟接风，二来庆贺老弟剿匪大功告成。”张作霖一笑：“既然兴权大哥如此热情，兄弟我恭敬不如从命，走。”席间，酒酣耳热之时，张作霖又大大地发泄了一通：“都说我张作霖当过胡子，可我他妈拿过谁一个笤帚疙瘩，死后也要人十八层地狱，脱驴变马去还人家。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大鼻子（指俄国人）赖在满洲不走，闹得盗匪蜂起。我们一群年青小伙子，眼看着国破家亡，没有保障，才自个儿想办法，让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成立大团，保护地面。有人说这就是胡子，因为朝廷并没允许我们这么干，对，我们那时候是不服天朝管的。后来，大鼻子和小鼻子（指日本人）开仗，洋鬼子打算利用我，我为了得武器，没法子，有时候也得叫他们利用利用。那时我们是得抢就抢，得骗就骗，但目的是为了武装自己，保护地

面，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胡子？后来感到不跟官家合作成不了大事，我才从了大清。咋的，有啥不光彩？”吴俊升知道张作霖这些话都是说给自己听的，是在敲打自己，却也只好和大家一起连声附和。

经过这次宴会，吴俊升和张作霖的关系大为缓和。但张作霖虽不再把他视为仇人，却仍然当作外人。吴俊升也在恭维的背后，暗暗地叫着劲，准备在仕途上压倒他。

此后，吴俊升率后路巡防营驻防郑家屯，张作霖率前路巡防营驻防洮南。双方都密切注视着奉天省内军政大局的变化，希望有机会介入干涉，执掌省政大权。张作霖对自己驻防洮南很不满意，因为洮南离省城太远，故而消息不如吴俊升灵通，进省城也不如吴俊升便当，更担心有什么好事会让他抢了先。于是，便几次和吴俊升商量，以家小在新民，洮南太远无法照料为由，要和吴俊升换防。吴俊升也不是傻瓜，当然知道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就以种种理由予以回绝。张作霖又请示奉天省当局，也没有得到同意，只好作罢。

吴俊升和张作霖在投机钻营方面都很“出类拔萃”，但在辛亥革命中，张作霖的表演却棋高一招，令吴俊升追悔莫及。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东北，东北革命党人也备受鼓舞，准备起义。不料消息走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闻讯后，决定与革命党人血战到底，他不敢依赖反复无常的张作霖等人，于是决定密调驻防通辽的吴俊升率部开往奉天，以防万一。但这一消息被张的“把兄弟”张景惠探知，并报告了张作霖。张认为良机不可错过，于是未经赵允许，擅自调动所部，立即赶到奉天。赵见张进城来见，颇觉奇怪；张对他说：“由于时局紧迫，唯恐总督身边危险，乃迫不及待，先行率兵保驾若总督认为未奉军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严惩”。赵见事已至此，迫

于形势紧急，只好默许。而后由赵补发一张调令了事，待吴俊升接到调令时，尚在云雾中，等他弄明情况时，已是时过境迁了。

张作霖进驻奉天后，赵尔巽给他讲了奉天的形势和自己的苦衷，张当即表示，坚决为大帅效犬马之劳。赵任命张为“剿匪”司令和奉天城防司令，统率 14 营，5000 多人。张进城后首先对新军首领蓝天蔚和革命党人张榕等进行了血腥镇压，以此作为他的“进荐礼”。

张作霖的政治投机非常成功。赵尔巽为奖赏他的护驾之功，把他的部队扩编为 15 个营，达到 5000 余人，使他控制了省城的军事大权，并在实力上大大超过了“四大重镇”的其他三人。后来，关内的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清王朝覆灭了。张作霖又随机应变，暗中投靠窃国大盗袁世凯，转而拥护共和了。

吴俊升觉得自己实力和张作霖不相上下，又有袁世凯的赏识，就想和张作霖一争高下。可是，张作霖驱逐张锡奎的举动使他放弃了这一打算。

张锡奎是袁世凯的亲信，此人昏聩无能，全仗袁世凯的势力维持自己的地位。辛亥革命前，他任奉天省营务处长，统辖奉天全省各路巡防营，是张作霖和吴俊升的顶头上司。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又提升他为奉天督军。张作霖对张锡奎是百般逢迎，千般巴结，甚至不惜屈身拜之为“义父”，希冀他在袁世凯面前为自己说些好话。但自他当上了二十七师师长，有了足够的武力后，便开始不把张锡奎放在眼里。他暗中结交其部下，把这个“义父”架空起来，事无大小，都必须先经过他，然后才能到督军公署报告张锡奎。张锡奎自知老朽，无力制服张作霖，只好忍气吞声，有时还屈驾造访张作霖。但张作霖急于取而代之，仍事事与他为难。张锡奎不得已，乃主动向袁世凯辞职，回了北京。

驱走了张锡奎，张作霖满以为这奉天督军就是他的了，他曾喜形于色地对部属说：“老子就要当奉天将军了。”不料，袁世凯又派了自己的另一个亲信段芝贵前来当督军，张作霖除了袁世凯表示“它日有机予以提拔”的空头支票外，什么也没得到。所以，他认为自己是白忙了一阵。其实，他不知道，事实上，他并没有白忙，因为他此举把吴俊升给镇住了。吴俊升见袁大总统的亲信都被张作霖赶走了，方知道张作霖的厉害，并看出奉天省将来必是张作霖的天下，自己与他对抗绝无好结果。如果抱住他的大腿，将来也少不了随着升官发财。于是，他改变了对张作霖的策略，开始处处巴结他，事事都唯他的马首是瞻了。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策划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后，贼心不死，时刻准备卷土重来。1915年12月，袁世凯洪宪帝制之举遭全国反对，其统治摇摇欲坠。日人川岛浪速之流认为时机已到，再次唆使善耆等宗社党分子与内蒙古上层民族分裂分子巴布扎布等勾结在一起，继续进行分裂中国的罪恶活动。1916年1月，巴布扎布所部百余人在康平县与吴俊升所部交战，巴布扎布部下3名匪首被擒杀。7月1日，巴布扎布叛匪在日本大尉青柳胜敏的指挥下，率“勤王复国军”3000余人，由呼伦贝尔盟喀尔喀河（今哈拉哈河）畔出发，向洮南方向窜扰。张作霖闻报，除令吴俊升派兵严防以免扰境外，还通电吉、黑两省当局，咨请拨兵协剿。吴俊升接电令亲率马、步、炮四五营往剿。吴到洮南后进行严密布防，特置陆炮两尊，在洮南堵卡以防该匪南窜，留陆炮两尊，饬炮二营营长舒永胜率队在开通防守。

巴布扎布所部叛匪，经吴俊升部围剿十数日，被击毙700余名，俘获200余名，剩余残匪四处逃散。吴俊升因功于同年10月授勋二位，获二等嘉禾章，一等文虎章，一等宝光章。

张作霖当上二十七师师长之后，便干预省政，架空督军，省

中军政各界纷纷奔走于他的门下。他的二十七师师部俨然成了奉天省第二督军公署。但他还不满足，仍紧锣密鼓，先后赶跑段芝贵，制服冯麟阁、汤玉麟，插手黑龙江，驱逐孟恩远，终于当上了“东北王”。吴俊升为了取得他的信任，借他的力量飞黄腾达，对他的这些行动采取了坚决支持的态度。由于吴俊升手中有实力，他的支持对张作霖十分重要。

1915年4月4日，段芝贵率600人卫队，威风凛凛地到奉天上任了。段芝贵和张锡銓一样都是袁世凯的亲信，但他和袁世凯的关系较张锡銓更加密切。他与赵秉钧、段祺瑞、王士珍并称为袁门的“四大天王”。袁世凯派段芝贵当奉天督军，就是为了掌握东北这个地处京、津背后的战略要地，为他称帝作准备。段芝贵也不负袁世凯的重托，到任后，立即着手拉拢张作霖、冯麟阁、吴俊升等地方军事实力派，希望他们能力袁世凯称帝效力。此时，正值袁世凯凶焰烛天、不可一世之时，张作霖当然不敢得罪他的红人段芝贵，只好极力巴结。他与段芝贵互换兰谱，结为“兄弟”，并以金银财物满足段芝贵的私欲，幻想通过段芝贵的沟通与美言来得到袁世凯的赏识。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为帝制大肆活动，张作霖认为表示效忠的时候到了，便在奉省军政两界积极鼓动拥戴袁世凯称帝，并致电袁世凯，表示拥护帝制。其电文称：“立国之道，在于长治久安。当今之际，实有决定国体之必要。然而有主张宣统皇帝复辟之说者，因其涣散人心，故余所不取。我大总统若非顺乎民意，身负天命，则将无以救国事于危亡。如东三省内有唱异议者，余将以死对之。”他又曾信誓旦旦地说：“设帝制不成，宁死而不欲生。”如此精诚，比起袁世凯的亲信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吴俊升见张作霖态度如此，便也到处鼓吹中国非行帝制不